《貨幣戰爭》誤導與流行的社會基礎

● 易憲容

宋鴻兵：《貨幣戰爭》(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貨幣戰爭》(下引只註頁碼)一書，交錯穿插於近二百餘年世界經濟、政治、社會乃至軍事戰爭，將許多最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統統與金融聯繫起來，並以此來宣稱已成功破譯了世界財富密碼，揭秘了國際金融的騙局及曝光了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參見封面宣傳)。類似的著作在美國曾出版過多本，但是這些故事並沒有引起美國主流社會太多注意。但是，《貨幣戰爭》一出版，在中國卻洛陽紙貴，據說在短期內銷售了二十萬本。何也？

在美國，由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每一個人都能夠根據個人喜好來表達任何觀點與意見，每一個人也能夠根據市場需要來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對於美國讀者來說，這些意見與故事的市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內容的客觀性。但是，不可思議的是，《貨幣戰爭》作者根據個人需要所剪裁的歷史，卻能夠在中國如此流行，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這既與《貨幣戰爭》對歷史的獨特剪裁術有關，也與當前中國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社會基礎、民眾心理及個人認知有關。本文希望對此現象作出反思，並指出該書的負面影響及其危害。

《貨幣戰爭》指出近現代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是少數國際銀行家為了爭奪「貨幣發行權」陰謀的結果；在作者看來，金融開放的本質就是一場「貨幣戰爭」，而缺乏戰爭的意識和準備就是中國當前最大的風險！

一 《貨幣戰爭》的內容、意見及主張

《貨幣戰爭》以金融為主線，把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美國歷史)串聯在一起。無論是歐洲的滑鐵盧之役、美國的獨立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還是美國歷史上出現的每一次總統遇刺事件，在《貨幣戰爭》中基本上都是國際上一部分銀行家為了爭奪「貨幣發行權」的陰謀所致。然而，按照作者的邏輯，不僅整個世界金融史需要完全調整，而且整個人類近代以來的歷史都必須完全改寫。

更為離譜的是，在這種改寫的歷史中，不僅整個金融市場運作充滿着權力與金錢的骯髒交易，而且充滿着戰爭血腥(參見第一、二章)。比如說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的興起，或是攀附於權貴、或是收買權貴、或是用金錢來征服及控制權貴，然後用這種權力來掠奪社會財富。金錢成了與權貴交往的資本。正是這種金錢與權貴的合謀，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當今世界擁有財富最多、最有權勢的家族。正如作者所言：「這樣的財富自然賦予了他〔羅斯柴爾德〕不可名狀的權力，甚至到了隨時可以讓政府內閣垮台的程度。」(頁16)金錢與權貴的無限循環也就構成了整個人類金融史的發展，主宰着現代人類文明的進程。

《貨幣戰爭》用金融把世界歷史事件聯繫了起來，但是這種聯繫以陰謀論或權謀論為主線。在書中，近現代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是少數國際銀行家為了爭奪「貨幣發行權」陰謀的結果；而且即使到了現在，這種對貨幣發行權的陰謀爭奪仍然沒有停止。因為在作者看來，金融開放的本質就是一場「貨幣戰爭」，而缺乏戰爭的意識和準備就是中國當前最大的風險(頁271)！

可以說，《貨幣戰爭》不僅捏造與杜撰了人類的歷史①，也顛倒和混淆了許多基本的金融學概念及生活常識，例如戰爭與市場競爭的區別。一般來說，戰爭是政治集團、民族(部落)或國家之間矛盾激化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最暴力的解決糾紛的手段。它也可以解釋為使用暴力手段對秩序的破壞與維護、崩潰與重建。而市場競爭則是指通過價格機制來調整產品的供求關係、改變資源配置及當事人的利益關係的運作機制。由於市場競爭的約束條件不同、競爭方式殊異，所得出的最後結果可能不一樣。

也就是說，戰爭是指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組織之間進行的零和博弈，而市場競爭則是以價格機制在當事人之間展開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因此，一般來說，戰爭的預期往往是對抗的一方吃掉另一方，是財富的浪費或毀滅；而市場競爭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贏博弈。市場競爭的結果可能是一方市場的擴大、另一方市場的縮小；也可能是競爭各方的市場擴大，實現多贏。市場競爭的結果往往是財富的創造或增長。而《貨幣戰爭》一書以戰爭來代替市場競爭，完全是從一個十分狹隘的角度來觀察人類事務。如果這樣來看世界，那麼這個世界肯定是不真實的或片面的。

戰爭是指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組織之間進行的零和博弈，是財富的浪費或毀滅；而市場競爭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贏博弈。《貨幣戰爭》一書以戰爭來代替市場競爭，完全是從一個十分狹隘的角度來觀察人類事務。

在《貨幣戰爭》的陰謀論下，不僅世界上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均是國際銀行家陰謀操弄的結果，而且任何個人、組織及政府財富的獲得與分配，也都出自權謀的操縱。也就是說，《貨幣戰爭》的基本教義，就是宣傳個人如何通過與權力接近並操縱權力來掠奪整個社會的財富，以實現個人的一夜暴富。《貨幣戰爭》表面上對國際銀行家「剪羊毛」式的掠奪恨之入骨，但實際上，其主旨就是要告訴讀者，如何通過權力或權謀的方式來掠奪他人的財富。除此之外，個人根本沒有財富增長的途徑。

其實，以陰謀論為主線講歷史的重大事件，描述市場的故事，分析金融市場的發展，會對讀者的金融知識及金融理念造成極大的誤導。《貨幣戰爭》混淆了貨幣發行權與金融創新和貨幣化的關係；混淆了信用與貨幣，包括流通中的金銀幣、紙幣現鈔、基礎貨幣、廣義貨幣和國債等概念及其相互關係；顛倒了貨幣發行與公共財政的因果關係。更為重要的是，此書否定了基本秩序及法治的確立對於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正是在這意義上，《貨幣戰爭》發行愈多，流行愈廣泛，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就愈大。

在近三、四十年裏，世界有93個國家發生112場經濟危機，42個國家幾乎爆發51場金融危機，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7年美國的次按危機。可以說，一部人類金融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關於金融危機的歷史。正如明斯基 (Hyman P. Minsky) 所指出的那樣，任何金融體系都存在着「內在不穩定」，即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是內在的、經常性，並有可能在較長的時期內處於潛伏期，而「穩定」是暫時的、表面上的②。因為，任何金融體系在促進儲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資轉化的過程中，總是不完全的，總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與限制。由於各種限制因素的存在，不僅造成了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而且潛藏着大量的系統性風險，這樣，金融對實際經濟波動的放大效應更為顯著。要化解金融風險及潛在的金融危機，最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通過深化金融改革來改變這種不穩定性③。

如果以《貨幣戰爭》的戰爭及權謀觀念來觀察人類金融史的發展，我們既無法認識金融市場的基本特性，也無法找到化解金融危機的辦法。《貨幣戰爭》指出「中國金融開放的最大風險是缺乏『戰爭』意識」(頁271)。如果按照這樣的主張，中國金融開放的問題就是如何與他國進行一場金融戰爭的零和博弈。在既對本國金融市場特性不了解又對他國金融市場不認識的情況下，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果發動這種金融戰爭，那麼中國必敗無疑。

《貨幣戰爭》指出，中國金融開放的問題就是如何與他國進行一場金融戰爭的零和博弈。在既對本國金融市場特性不了解又對他國金融市場不認識的情況下，發動這種金融戰爭，中國必敗無疑。

在現代社會中，市場經濟是最基本的制度規則，它的正當性就在於個人自主的權利能夠得到最大的擴張④。因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自在地把自己的東西、技術或知識自願地與其他人交換，以增加彼此的利益。但是，為了保證這些不可分割的個人利益的交換與分工得以順利完成，避免或減少不斷擴張中的個人利益之間發生衝突，每一個人都要

如果人類歷史演進、金融市場運作、正式組織產生等只不過是戰爭和權謀，社會財富的獲得與分配便只能通過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規則（權謀）來進行。整個社會根本不需要建立起正式的規則或法治制度。圖為負責制定和執行中國貨幣政策的中國人民銀行。

交出部分的權利形成公權力，產生制度、確立法律及建立組織等。這就是現代社會法治的根源。

但是，如果人類歷史演進、金融市場運作、正式組織產生等只不過是戰爭，只不過是權謀，那麼社會財富的獲得與分配便只能通過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規則（權謀）來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社會根本不需要建立起正式的規則或法治制度，也不需要確立起一套獨立有效的立法與司法體系，更不需要建立起一套對金融市場運作有效的信息披露和監管制度。這也是《貨幣戰爭》極力詆毀中央銀行制度，無端攻擊美國聯儲局（Fed，以下簡稱「美聯儲」）的根本原因（參見第三章等）。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任何金融體系都存在着「內在不穩定」，因此，許多金融制度與組織的創立，其目的就是減少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比如說，美聯儲的創立，為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保證。但是，《貨幣戰爭》指責美聯儲是一家私人化的中央銀行，僅為少數私人股東服務。這不僅與現實不符，而且也否定了金融市場建立正式制度規則的重要性。

其實，從美國金融史的發展歷程來看，在美聯儲成立之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漲、各銀行貨幣發行泛濫、偽幣成災、銀行危機接連發生，1907年的銀行危機更是讓美國不少地區信用支付體系崩潰⑤。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會在經過反覆的研討與辯論後才通過了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美聯儲正是根據該法而設立。美聯儲的設立是現代金融監管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標誌着美國及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形成。美聯儲從具體的金融業務中走出來，成為獨立的監管者，以維持金融體系穩

定、提供安全的金融環境及制訂金融運作規則為目的。

對此，前美聯儲主席沃克爾(Paul A. Volcker)在1984年解釋得十分清楚。他認為，美聯儲的基本職能就是充當「全國支付系統的主要參與者；通過貼現窗口貸款成為流動性的最終來源；對國內國際金融市場的一些重要部門進行監管。與單純的『貨幣性』職能相比，這些職能是相對獨立的，而且時間更早。」⑥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公權力機構，美聯儲的基本職能是維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而其「貨幣性」職能只不過是維持這種穩定的工具而已。正因為美聯儲的基本職能具有公共性，因此它是公開透明的、具有極大獨立性的公立機構，與私人公司的行為完全無關。《貨幣戰爭》之所以極力詆毀美聯儲，根本上是想藉此來否定現代金融市場中正式的機構組織及法律制度。這亦反過來證明了戰爭、陰謀及權謀等方式可以為現代文明的制度規則所化解與消融。

在《貨幣戰爭》一書中，復歸金本位是作者的基本主張。作者認為，在1914年前的250年間，歐洲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穩定繁榮，就是在於金本位體系下，黃金成了價格動蕩的定海神針。黃金作為一種價格尺度，它能夠約束人們對純粹信用貨幣的瘋狂追逐和金融財富的無節制膨脹；它能夠減少發達國家通過榨取貨幣發行來進行國際間的剝削；它能夠減少利用匯率操縱來獲得不正當利益，保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體系的公平公正性(頁256)。

然而，金本位不僅在歷史上從未能證明其持續成功的經驗，也沒有證據顯示當前存在能夠讓金本位得以存在的基礎。因此，相對於信用本位的優勢來說，要讓國際金融市場重新回歸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仍然是一種渺茫的夢想。事實上，金本位最為盛行的時期應該是1880至1913年這一段時間。在《貨幣戰爭》的作者看來，這一段時間裏，由於英國採取金本位制度，從而使得國勢強大、經濟實力雄厚、海外市場眾多，以及以英國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確立等。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金本位制度之所以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是與當時國際經濟繁榮、科技進步迅速、政治形勢穩定等有關，而且也與金本位所適用的範圍不大等因素有關。

作者認為金本位制度的成功是無條件的、與信用制度無關的，只要回復金本位，整個金融市場的矛盾與問題就能輕易化解。這種解釋既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不知曉金融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除此之外，還與當時各國經濟對外貿易平衡是建立在對內平衡基礎之上、共同遵守支付規則、持續黃金自由流通、匯率穩定等因素有關。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在這個時期信用貨幣也是空前發展。在當時歐洲各國，信用貨幣的增加佔貨幣擴張總額的90%以上，到1913年，信用貨幣佔全世界貨幣供給總量差不多90%⑦。信用貨幣的擴張使得貨幣供給不受黃金數量的限制，世界經濟與貿易因此得以順利擴張，金本位制度才得以順利地有效運行。也就是說，要保證金本位制度有效運行不僅需要絕佳的客觀條件，而且也必須建立在發達的信用貨幣制度的基礎之上。

還有，黃金作為一種貨幣(不是《貨幣戰爭》所說的商品)，不僅

在於貨幣的發展最終要用信用貨幣來替代，而且在於兩者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可以說，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崩潰之後，國際貨幣體系正式進入信用本位體系。應該說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交易已經不是簡單的即時支付，即不是用商品購買商品，也不是錢貨兩清。

事實上，市場經濟中任何交易通常都包含着某種形式的賒銷或預付。在這種情況下，信用由此產生了。而作為一種計價工具、支付清算的方式及交易媒介，貨幣直接對應的僅是實際的財富，信用則是通過貨幣借貸對這些財富的重新分配。貨幣是信用的基礎，信用則是貨幣未來價值的實現形式。也就是說，對於現代經濟來說，不僅貨幣與信用兩者的密切性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信用的發展是促使現代經濟發展與繁榮的根本所在，它是任何東西都不能替代的⑧。

如果說現代經濟不是建立在信用本位的基礎上，那麼，我們不僅無法產生現代的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以及創新各種金融產品，而且也無法形成一系列的金融監管制度與規則。銀行信用的創造不僅推動了實體經濟的循環與發展，而且也促使了金融產品與市場的出現。當然，信用的擴張不僅化解了貨幣本位的金融約束，促進了市場與經濟的繁榮；而且信用的快速擴張也會使得整個經濟體系與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加劇。現代金融制度、金融市場規則與金融組織也由此產生。

在改革開放後，「利」或「利益」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有權力就有與金錢交易的資本，有權力就有財富與生活的一切所需。《貨幣戰爭》的陰謀論及權謀思想，正好迎合社會上這種一夜暴富觀及權力欲。

但是，在《貨幣戰爭》的作者看來，金本位制度的成功是無條件的、與信用制度無關 (參見第九章) 。因此，只要回復金本位，整個金融市場的矛盾與問題就能輕易化解。特別是，面對着動蕩不安的國際金融市場，《貨幣戰爭》更是主張中國社會要藏金於民 (頁277) 。可以說，這種解釋既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不知曉金融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因為，在現代經濟中，離開了現代信用制度或信用本位，現代金融市場便沒有存在的基礎。正是在這重意義上說，《貨幣戰爭》希望回歸金本位，否定現代信用本位，實際上否定現代金融市場的內在規律性，阻礙了人們對現代金融市場對內在規律性的認識與了解。

總之，《貨幣戰爭》一書所涉及的離譜內容可謂比比皆是，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觀點更是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相去很遠。對此，本文的討論可以說是掛一漏萬。

二　為甚麼《貨幣戰爭》能夠在中國流行？

可以說，與《貨幣戰爭》類似的說辭，在美國及歐洲不會有很多人關注。但是，《貨幣戰爭》能夠在短期內在中國內地廣泛流行，成為當前大眾廣泛閱讀的東西，其問題就不一般了。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樣，此書逆現代文明而行，那麼，它之所以流行，可能與中國現在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及人們對金融知識的認知水平有關。

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及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變。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經濟改革是一個由傳統經濟、計劃經濟向現代經濟、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傳統的經濟秩序不斷地被摧毀，但是新的經濟秩序則無法在短時間內得以建立。特別是在打破舊傳統、摧毀舊觀念的過程中，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已蕩然無存。傳統價值觀念及傳統制度體系被徹底摧毀，現代民主與自由的制度與觀念尚有待成長。1949年後的中國形成了計劃經濟新傳統；改革開放以來，儘管市場經濟理念得以廣泛傳播，但是計劃經濟的幽靈依然阻礙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

正是這種近一個世紀以來經濟社會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轉型，制度、規則、觀念及價值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毀、被更迭，使當前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也蕩然無存。特別在改革開放後，面對個人財富的快速增長，面對社會財富愈來愈分配不公，「利」或「利益」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制度規則的確定、個人行為的準則、組織確定的標準等，都以「利」來衡量。

那麼「利」又如何來？儘管市場經濟在近三十年來大行其道，但是現實生活同樣告訴國人，計劃經濟的影響並沒有結束，權力成了最好的獲利方式與途徑。更有甚者，廣泛的市場為這種權力與金錢的交易提供了最為便利的平台。對權力擁有者來說，重要的不僅在於如何掌握手中的權力，而是在於如何獲得權力。前者是指利用公權力來為個人及相應組織謀利，即各種權力與金錢的交易；而且這種交易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隱性的，甚至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到。後者既有金錢與權力的交易，也有權力運行的機巧，如權謀。

這樣，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有權力就有與金錢交易的資本，有權力就有財富與生活的一切所需。《貨幣戰爭》的陰謀論及權謀思想，正好迎合社會上這種一夜暴富觀及權力欲。《貨幣戰爭》不僅論證了這種一夜暴富、權力與金錢交易的合理性，也讓國人以為，這種財富觀與權力欲本來就是合理，它並非是中國獨有的產物，即使是在現代文明程度較高的歐美社會也同樣如此。

以上分析僅是對權力擁有者而言。對於無權者或弱勢民眾來說，他們一方面迫於生活的無奈只能忍受各種權力侵害其利益，比如一個交強險，別人撞了你，你不僅得不到賠償，反之還要賠償撞你的人400元。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有「法律」有制度，弱者告無所告。而正是在這種無奈無助中，弱者唯一能夠改變自己的，就是要知道別人如何用陰謀及權力來掠奪其財富，學會如何用權謀來獲得這樣的權力。

還有，目前中國已進入了平民化的投資時代。在計劃經濟時代，廣大民眾手上沒有財富，或是民眾能夠轉化成資本的財富很有限，因此，那時民眾根本談不上去投資及掌握金融知識。而目前中國居民財

對於民眾來說，如何以最快的方式獲得平民化投資所需要的知識，成了國內金融知識普及教育的重要一環。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幣戰爭》貌似成了民眾獲得現代金融知識的一個途徑，書中所講的故事都被廣大民眾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實。

富的增長、金融市場的繁榮都為民眾投資提供了廣泛渠道。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民眾對金融及歷史知識的了解十分有限。對於民眾來說，如何以最快的方式獲得平民化投資所需要的知識，也成了國內金融知識普及教育的重要一環。

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幣戰爭》貌似成了民眾獲得現代金融知識的一個途徑。對於廣大的民眾來說，正是在這種知識背景及認知水平的基礎上，《貨幣戰爭》所講的故事都被廣大民眾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實。因為，對於國內廣大的投資者或民眾來說，他們還沒有相應的知識水平來識別《貨幣戰爭》所講故事的真假。

總之，《貨幣戰爭》的流行是與當前文化背景、社會心理及價值觀念密切相關的。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市場上流行的書籍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從這些流行書籍的變化，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貨幣戰爭》的出現不是引導整個社會積極向上，而是在固化以「利」為主導的社會流行觀念。這種流行的觀念必然與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相衝突，必然會誤導整個中國社會大眾對金融知識的汲取，必然會有損於中國金融市場建立賴以為基礎的基本文化觀念及核心價值。正是在這重意義上說，對《貨幣戰爭》在中國廣泛流行應該密切關注，特別是當《貨幣戰爭》的觀念成了我們經濟生活的主流意識時，也顯現出整個中國正在向下沉淪。因此，筆者寫本文是希望整個社會對《貨幣戰爭》這種現象進行更多更深刻的反思，特別是我們的出版者及作者，除了「利」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東西可提供嗎？

註釋

① 參見胡祖六：〈子虛烏有的「貨幣戰爭」〉，《財經》，2007年第25期，頁161-63。

② Hyman P.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 no. 1 (2003): 5-50.

④ 金觀濤：〈現代性及其面臨的挑戰——當代社會價值基礎和問題的思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10月號，頁70-81。

⑤ 易憲容：〈金融監管多元化體系的確立與演進〉，載李揚等主編：《中國金融理論前沿》，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⑥ Paul A. Volcker, "The Federal Reserve Position on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Responsibiliti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 70 (July 1984): 547-57.

⑦ 歐陽勛、黃仁德：《國際金融理論與制度》（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558。

⑧ 瞿強：《資產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易憲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